

宋庆龄救助战灾儿童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 齐超儒

全面抗战爆发后，残酷的战争使得千千万万的家庭支离破碎，产生了大量的难民以及孤儿难童。抢救和收容战时难童成为战时中国迫切的任务。战时儿童保育会、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以及全国孤儿救济委员会等社会救济组织相继成立，但这些组织所建立的收容所、保育院大多集中在国统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战灾儿童很难获得救助。因此，救济这些地区的战灾儿童成为宋庆龄十分关心的事情，她以个人崇高的声望，广泛联络和动员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争取支持，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筹设孤儿院

1938年3月，由宋美龄领衔发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后，随即展开儿童救济工作，在江西、广东、四川、香港等14个省区成立分会，在交通便利邻近战区场所，设立临时保育院，在内地设立永久保育院。但是这些保育院更多地集中在国统区，不能满足巨大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儿童来说。因此，1939年初，由保盟提供资金在陕西三原建立了一个可容纳500名儿童的孤儿院，其中三分之一是婴儿，其余的是一些大孩子，孤儿院建成后就接纳了200名孤儿。后来，这所孤儿院与陕西边区孤儿院合并，入院的儿童增至400名。

为了募集更多的物资，帮助更多的受灾儿童，宋庆龄于1939年3月28日发表了《救济战灾儿童》一文，她特别指出“这些因战争变得无家可归和无所依靠的儿童，除了同情和资助还需要比我们的同情和恩惠要多得多。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

在同年印发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又重新刊登了宋庆龄的这份呼吁以及关于三原孤儿院的报告。保盟在三原孤儿院的报告中，除了介绍孤儿院的情况外，还特别强调：“孤儿院的宗旨是不但培养有用的公民，并且培养出中国战后建设的领导者。”在宋庆龄看来，孤儿院的作用不仅仅是救助儿童，更重要的是培育健全的人格和爱国情绪，能够在将来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

1940年10月，保盟委托美国医疗援华会把他们募集到的22500美元全部购买强化维他命制剂、酵母片、葡萄糖、乳酸磷酸钙以及奶粉、含糖炼乳、鱼肝油等营养食物，并将这些物品转交给边区孤儿保育院以及保盟援助的其他儿童救济项目。

援助中央托儿所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将士在前线作战，他们的孩子无人照看。整个延安时期有4000个孩子出生，很多人把孩子托放在老乡家或把孩子组织在一起照看，但后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有些孩子被烫伤、病死、丢失。

为解决前方战士和根据地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在卫生部长傅连璋的倡导下，经毛泽东批准，1940年夏在距离延安不远的兰家坪的山坡上，建立了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有7个孩子，有7间窑洞，后来逐渐有所扩大，但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进入到1942年，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导致延安生活物资紧缺，中央托儿所也进入困难时期。宋庆龄得知后，以“保盟中国同盟”的名义与美国洛杉矶的援华机构和爱国华侨取得联系，将募集到的食品、玩具、药品和幼儿生活用品送往延安，用于改善和扩建延安中央机关托儿所。

1942年5月，为了感谢支援中国抗战的洛杉矶市的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建成后，宋庆龄还将此作为范例，通过向国外的援华机构和个人介绍洛杉矶托儿所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她在给澳大利亚呼吁筹赈会主席黄家权的信中提道：“我们向世界上某些社会团体募款，以供应一个特定的托儿所，或者创办一个新的托儿所。新托儿所将以某一捐款的城市命名，例如‘悉尼托儿所’。这种方式有一个先例，那就是设在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是用洛杉矶华侨的捐资兴建的。或许悉尼市能参与诸如此类的创举。”

在宋庆龄的帮助和支持下，洛杉矶托儿所的规模和学生数量不断扩大，由最早7间窑洞，增加为20多间窑洞，还有数间平房，孩子也由最初的7个增加到近百个。许多党政军领导人的孩子，像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等也都在洛杉矶托儿所生活过。洛杉矶托儿所的发展还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46年毛泽东到托儿所看望孩子和保教人员时，为托儿所题词“已有进步，要求进步”。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受邀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和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并向宋庆龄献花。